

两位教师一段情

◆ 贾志敏



■ 一见如故的两位语文老师(右为本文作者)

八年前，我的身体有恙，动了手术。老于得知以后多次遣人垂询，来电慰问。初春，接老于电话称，徐州教育局要举办“于永正从教50周年”活动，真诚希望我出席此会，我应允了。岂知，到了盛夏，我旧病复发再次入院手术。临会前，我通知大会筹备处恐怕不能赴会。老于得知，旋即来电，表示理解之余又问，有无可能克服困难？我回答：“这回我就不来了吧！”就因为我的话语里面多了一个“吧”字，让他感到事情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贾老师，你‘五十年’的时候，我可专程赶到上海的呀……”

以往，他一直称呼我“老贾”，突然改称为“贾老师”，我明白，这一回他是认真的，是真诚希望我出席这一次活动的。9月下旬，活动如期举行。是日下午，我在亲属搀扶下，从上海赶到徐州向于老师祝贺。“相逢一笑，相送还成泣”。会上，老于老泪纵横，说：“感谢贾老师以及各位来宾。哎！年轻时候不会教书。如今会教书了，却老了，该退休了。”他一心想着的，还是站在讲台上为孩子们授课。

秋风萧瑟。我告诉他：“没有不散的宴席。‘所是同袍者，相逢尽衰老’。我们要服老。明年我不想‘干’了！”

老于说：“我也有点力不从心。可是我放心不下当今的小学语文。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要摇旗呐喊，还要振臂高呼。不能身体力行，仍寄希望于青年一代。为孩子，为语文，咱们再作最后贡献！”

“行色秋将晚，交情老更亲。”

一介书生

老于，一介书生，是个出了名的“大好人”。他为人耿直，心口如一，遇有骨鲠在喉，必一吐为快。

前些年，语文课堂热闹非凡，教学手段推陈出新。只是多了些花样经，少了些语文味。对此，他提出：要“简简单单教语文”。这些年，一些中青年教师喜欢在“语文”前冠以各种修饰词，标新立异，独树一帜。有人问老于，你教的算哪门子语文？他说自己“无门无派”。还强调，语文就是语文，何必叠加这些苍白的形容词：“语文教学”就是“教学生学习语言，运用语言。”重要的是，怎样去“引导”孩子，“激励”学生。老于的这番真知灼见，颇具见地。

三年前，获悉老于心血管似乎出了点毛病，我们都忧心忡忡。然而，当我们还能看到他在各地的行踪，还能在各类杂志上拜读他的文章时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其实，心里头

一直在为他祈祷。对此，他却不以为然，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。相反，还经常发短信安慰我：

“让我们过好每一天！我们的一生有长度，更有宽度，足矣！”

“昨天，‘骨穿’结果出来了，正常。又一次‘死里逃生’，不日即可出院。”

有一天，老于转发来一个青年作者短信，要我为这个青年的著作写一个推荐语。原来，这位青年出了一本书，想请老于和我为其在封面上写个推荐语。老于还说，“此作者接连要求两次，我勉强应允了，你也答应他吧！”

我想，老于真是“大好人”，此作者是何等样的人都没搞清楚，书里边写了些啥也没弄明白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将其推荐给孩子呢？于是，我婉拒了：“第一，不认识此人；第二，未见到书，不知道它主张什么。我不能做糊弄孩子的事。我不能写这个推荐语。”须臾，他发来仅两个字的短信：“是的。”显得很无奈。

后来老于有没有写“推荐语”——若是写了，又写了些什么？等等，我均不清楚。然而，由此可见老于确实确实是个“大好人”。

一语成讖

五年前的一天，我在某地讲课。恰巧，老于也在，我们俩又同寝一室，通宵达旦交谈甚欢。因为他已经讲完课，所以次日天还没有天亮，就不辞而别，直奔机场回徐州老家了。

下午轮到我上课。记得，我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：“老于走了，今天早晨五点走的。他走得有点匆忙，连招呼也没有打……”全场顿时哄笑起来。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，正纳闷时，瞬间恍然大悟，于是说：“你们不笑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；你们这么一笑，事情给弄复杂了，把我说的意思全变了。”顿了顿，我自我解嘲，“这个‘走’字居然还可以表示‘这个’意思。咱们的汉语真是博大精深……”

不知为什么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。我冥冥中有些担心：会不会让我一语成讖？……

我的预言竟然不幸被言中而且迅速变成了现实：“老于走了，早晨五点走的。他走得有点匆忙，连招呼也没有打。”

呜呼！

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我无论如何不会这么说了。

老于先于我们走了，老于太喜欢站在讲台上教语文了！我想，在天堂里，他可以继续教语文。而且，会教得更出色。

大年初五，旧俗要“迎财神”，而我，迎来了一件“至宝”——友人兴冲冲登门造访，送给我一部大16开的英语版大书。这部紫色封面、名为《政治学词典》(Dictionary of Politics)的书厚956页，精选涉及国际政治和公法4800条名词术语并加以定义。捧在手里沉甸甸的，称了称，竟有5斤2两之重！品相很好，这么大一部书，竟没有一点折痕和破损，硬面抄封面、封底都是方方正正的，四周棱角分明。从微微发黄的纸张可知，其“书龄”已有数十载之久。翻检图书在编编目，果见该书出版于1978年，当时已是第六版(上海图书馆藏有该版书籍。至1992年又出了最后一版)，距今近半个世纪了。

朋友了解我的“洋泾浜”英语水平，他送我这样一部全版英语书籍，不只是让我阅读的，主要是给我作收藏的——他素知我有收藏各类经典资料(如刊有重大事件报道和图片的报纸杂志书籍等)的嗜好。今天他送我这部书绝非仅仅因其年代久远值多少钱，肯定是因其有着比较特别意义的缘故。当然，要知道一本书的价值所在，只须把它前前后后翻检一遍即可明白个大概了。我打开书的扉页，一段秀挺挺拔大气的英语手书映入眼帘。友人指着第一行字说，它的意思是“赠邓小平先生”，其中“邓小平”的名字是用“威妥玛拼音”书写的(怪不得我只看懂最后一个“ping”字)。闻此，我吃惊地叫了起来：这部书是外国友人赠小平同志的？友人点点头，指着这段英语手书，一字一句地翻译道：

赠邓小平先生——

20世纪最伟大的国家领袖和政治家，真正的伟人！

致以最诚挚的祝愿。

沃尔特·雷蒙

弗吉尼亚州劳伦斯维尔(地址)

1978年12月31日

看到“1978年12月31日”，我情不自禁地再次惊呼起来：那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仅9天的日子吗？友人要从网上查三中全会开会的日子，我摆摆手说，不用查了，这个日子我记得最清楚了——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。友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。他告诉我，已查阅相关资料，本书作者就是赠书者雷蒙，生于1930年，卒于2007年，是美国政治学学者、出版家，1978年曾来中国访问，上

面的英文手书为其亲笔所写。

说这本书是美国友人赠送给邓小平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因为这部书的第二页扉页右下角留有“美大司”字样的印章，章内间有钢笔手书“一处”两字，厚厚的书口(即翻书处)从上到下一连盖着3颗同样的印章。说明此书是作者欲通过中国外交部美大司(即北美大洋洲司)把书转呈给邓小平的。至于此书的流转以及书上是否留有邓小平本人的印迹，需至“美大司”考证方能得知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时，书的“所有权”属邓公。它最后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辗转流落，到了我这个小小书迷手中，我就没法管啦！

随便翻翻，可见书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词条：如P386中的“毛泽东思想”；P628中“关于美中联合公报”；P631中的“简单多数”——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个词条(共3行)的顶端打有“√”，第二、第三行文的下面还有“√”。

第二、第三行文的下面还有“√”的表示重点的曲线，这种情况在全书再没有见到。我和友人分析，是否“美大司一处”没将此书转交小平同志，他们自己使用了；或者在转交之前他们先翻阅了此书，要知道那个时候这一类书尤其是全版外语的，是少之又少的。

有趣的是，翻书时还从内页蹦出一张1997年7月29日由北京开往徐州的火车票，背面还有钢笔书写的票主的署名“陈茂伟”三字及联系电话，其笔迹及钢笔书写时所用墨水的颜色均与上述“一处”两字相同……大胆推测，陈君很可能就是“美大司”的工作人员，而且就是“美大司”印章中书写“一处”两字的人。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不知为何携带此书乘火车了。

我问友人，这本书怎么会到你手中之？他哈哈大笑：说起书来的由，还与您自己有关呢！见我一脸疑惑的样子，他说：前一阵我不是心里不痛快么，您说有些有趣的书可以解闷，而我家里的书多是专业方面的，于是我从网上寻得一大堆“有趣的书”，看到有关这本书的介绍，我觉得您肯定会喜欢，于是顺带着买了。望着眼前这张年轻的面孔，我不由暗叹，这年轻人不但懂得多，而且如此善解人意……

能在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得到如此有意义的礼物，我实在是大喜过望。

(下图为封面及题赠页影)

大年初五获『宝』记

◆ 赵进一

